

对话

写下生活，
也写下期许与希望

■ 刘星元 王文鹏

让每篇作品都呈现出鲜活独特的面貌

王文鹏:星元好,很高兴又能和你聊创作,特别是聊你的散文创作。有件事情我印象很深,2023年夏天,你、我与张立军在北京的大街上闲逛时,你说你特别关注各地的桥、廊桥、天桥、跨河大桥等,希望以这些桥为链接,写一篇散文。这篇文章目前写完了吗?

刘星元:谢谢文鹏。经你提醒,想起那些与朋友们相聚的时日,那时有更多的空闲,对自己的创作也有诸多思考。你提起的桥,只是当时构思的一本书中的一个部分,当时还想到车站、机场、街巷、博物馆这些地方取材。我许久之前就在刻意收集去过的城市的资料,想着写一写不同城市的不同物象,对简短时间内事物呈现的状态进行观察、描摹与书写,可长可短。作为一名观察者和缘分浅淡的在场者,我想写表象、写细节,写微小浮冰之下的巨大冰山,写即时背景下各色陌生人相似或不同的状态,企图虽然片面但相对真实地刻画当下。刻画当下即是刻画我自己。遗憾的是,这个构想尚不成熟,我的创作节奏又比较迟缓,还在不断积累素材。

王文鹏:我曾经也写过几年散文,觉得散文创作对个人经验的消耗十分严重,你有没有类似的问题?你在日常写作过程中,如何拓展散文素材?

刘星元:如你所说,我能深切地感受到散文对个人经验的严重消耗。事实上,有位老师就曾指出,我在两篇不同的作品里,曾出现相似的情节。我们的经验相互勾连,并不是独立的,有时候,一些情节无可替代,你会反复提及。但这件事也给予我告诫:要丰富自己的阅历,提升自己处理素材的技艺,尽量做到避免重复自己的经验,让每一篇作品都呈现出鲜活而独特的面貌。

说到拓展散文素材,每个写作者会有相似的路径,比如生活经验和阅读消化。我也一样,平时利用各种方式收集觉得有价值的素材,期待什么时候用得上。文学作品是作者对自身经验的提取和挥发,一个人几乎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局限,去书写完全陌生的题材。但人的经验毕竟有限,况且,全知全能者未必就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书写者。有时候,最重要的不是获取足够多的经验素材,而是不断磨砺自己的技艺,让相似的素材在不同文本中焕发出不同质地的光泽。

真实触摸到当下的县城悲欢

王文鹏:今年《十月》第1期发表了你的散文《剧院词典》,这篇文章被放在“县,在出发”栏目,让我联想到你的散文集《小城的年轮》。提到县城,大家联想到的或许是“土气”,县城在文学场域内的位置就像它在现实中一样尴尬,是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跳板。但如果真的下沉去了解,县城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,早已超脱所谓“跳板”的功能性,是真正的生活空间,是城市的另一种呈现。在文学的呈现上,县城不算醒

2024年4月至6月,作为一种别样的影像风格“出圈”的“县城文学”引发网络热议,但讨论的结果却走向分歧。认同也好,反对也罢,新的诉求却逐渐明晰:我们需要真实的县城文学。

几乎同时,刘星元的《小城的年轮》沉静面世,他的“县城文学”在纸上成形。这本集中而扎实地书作家寄身的小县城的散文集,并没有在网络流量的瞬息漂移中“出圈”,但在当下散文的县城书写中,无疑是坚实的“在场”。

在传统文学领域,县城书写的嬗变与城乡格局的演变同步。改革开放初期,乡土文学是主流,县城是“寡言少语”的;随着现代化、城镇化进程的加快,县城又成为乡村走向大城市的通道与跳板,同时渐渐成为“进城失败者”的退守之地;而今,随着城乡在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,县城又成为疗愈之地或守成之所。在类似的书写中,县城都不是独立存在的,而是城乡探讨之余的连带、过渡、补充与附加。近年来,一批书写县城的力作涌现,县城得以以主角的面目亮相,得以为自己“代言”。刘星元笔下的县城亦是如此。

刘星元笔下的县城眉目清晰而舒展,它自身颇具辨识度的地方景观得到了展现。一般而言,景观被划分为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,但在刘星元笔下,县城的自然景观较少地呈现为河流和矮山,算不上主要的书写对象。因此,结合刘星元对县城书写的实际风貌,或许可以将之粗浅地分为两类,一类是作为县城叙事的空间场所,比如拆迁工地、剧场、阑尾街、福安巷、农贸市场、第五岔道、火车站、桥墩下、窗台前、城中村等,故事发



《尘与光》,刘星元著,作家出版社,2021年9月

似命中注定的阴影本就不该存在。

我注意到,许多写作者写到乡村时,仍停留在乡村牧歌式的咏叹里,似乎外面的风永远吹不到乡野。于是,我坚持在作品里用大篇幅书写当下,写乡村正在发生变化的事物及人物。比如,我写到了智能手机扫码支付功能:农村老人喜欢将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带到集市售卖,以此补贴家用,但他们用的都是老年机,没法开通收款码,就算是开通了,那些虚拟钱币,进入的可能也只是儿女的账户。我以自己的手机为证,五角、一元、三元、五元……我手机上每日收到的二三十块钱,正是父母摆摊所得,并被我冒领。便捷的支付方式,固然是时代进步的表现,但“进步”这个词并不具备全民性,它以自行的推广标准,礼貌地拒绝了小部分人的参与,而这些被限制入场的人,往往滞留于旧的生活方式里,是时代的脱节者。我更希望自己能将这些当下的变化写下来,写下彷徨无措,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与希望。我个人偏执地认为,这才是“乡土文学”的价值所在。

不同写作技法的融合会相得益彰

王文鹏:《清明》2024年第5期发了你的一篇小说《骑士地图》,但我了解到,这篇作品你是以散文文体投稿的。散文被以小说发表,这个事情很有意思。你这篇文章以“我”和邱永杰双线叙事,围绕理想和现实两个维度延展,开放式的结尾颇为点睛。你怎么区分散文和小说?小说技法对散文创作是否具备侵略性?

刘星元:散文当作小说发表这事,我感觉挺有意思。这篇文章算是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。我自己的作品,若非必要,绝不再去读,毕竟挺难为情的。这篇作品发表之后,因为背后有段这样的趣事,我又读了一篇,的确,我不经意间运用了过多的小说技法,说是散文可以,说是小说也没错。正如沈从文、汪曾祺、史铁生的诸多作品,文体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,将它划为什么,它就是什么。我记得咱们闲聊时曾短暂说起这



《小城的年轮》,刘星元著,北岳文艺出版社,2024年4月

个话题:说到底,并没有严格的文体之分,要说区分,不如去区分好文章或坏文章更有价值。有时候,我们很难去区分散文和小说。我私下揣测,文体概念,可能更多的是批评家、编撰者为了方便自己的梳理和研究而弄出的分类,就像亲情、友情、爱情文章那样的分类。作为写作者,不应被这种分类所拘束,不能躺在笼子里面雕琢事物。但这并非说散文与诗歌、小说、剧本没有任何区别。相比其他文体,散文的文风更倾向直接和生活化。

我不觉得小说技法对散文创作具备侵略性,相反,两者融合会相得益彰。我写过许多年的诗,尽管技艺不佳,但不影响我对诗歌的基础审美。也读过一些小说,它们教会我如何处理散文文本里的写作难点。甚至,电影技法对我的散文写作助力也很大。在散文写作中,我不可避免地蒙上了诗歌与小说的影子,尝试在叙事中交互运用虚构和非虚构手法,尝试用诗性元素建立起不同文体的互援关系,以期使语言更具弹性和美感。虽然这些尝试尚未抵达我想要的效果,但我心向往之,并且坚信,已经有更优秀的写作者到达。

王文鹏:提起生活,很多细节都呈现出来。我记得你有一个小爱好,听悬疑故事,还因为耳机坏了而着急。听悬疑故事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?你在不写作的时候,会时常将生活与写作链接吗?

刘星元:这点儿小癖好被你揭开,还挺为难的。听悬疑故事对我来说纯粹就是消遣,对写作也没有什么帮助,为此还消磨了大把时间,与大家刷短视频上瘾类似——懊悔浪费时间,事后依旧不改。尽管会在作品中无数次提及生活,但我从不愿将生活过成创作素材。实际上,我始终不愿将生活圈与写作圈混为一谈,不愿生活在圈里的朋友知晓和关注我的创作与作



刘星元,1987年生,山东临沂人,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。出版有散文集《小城的年轮》《大地契约》《尘与光》,曾获三毛散文奖、东坡诗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山东文学奖。

品。说个经常遭遇的事:有几个熟人,电梯里遇见,时常会聊起我的作品、获奖消息,或者询问写作计划。他们并不一定是对写作这个话题感兴趣,或许只是找个话题,避免相顾无言的尴尬。这样一来,他们不尴尬了,我却待不住了——电梯里还有数位认识或不认识的旁观者,尴尬至极的我只能打哈哈搪塞过去,期待电梯迅速到达指定楼层,我和话题操控者中有一人抬脚离开。固然,写作是正大光明的事,但在那一刻,我只感到羞耻和难堪——似乎自己一直在做丢人现眼的事,而有人恰好在此时揭开了真相。

王文鹏:我一直信奉一点:一个作者的写作才华几乎等同于他的阅读才华,所以与朋友在一块儿时,我总喜欢探听他们的阅读视野,让他们吐露一些阅读感受。最近你在读什么书,又从这些书里得到了什么?

刘星元:我在《蒙尘的故人》这篇短文里写到与你的交往,并提起你推荐给我的经典作家: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、安东尼奥·塔布齐、萨曼塔·施维伯林、费利斯贝托·埃尔南德斯、理查德·布劳提根、若泽·爱德华多·阿瓜卢萨……我试着读了一部分,有些的确对我颇有裨益。

之前读书广撒网,摸到什么就读什么,这两年更希望对某几个作家进行较为深入的阅读。目前手头在读的其中一本书是杜拉斯的《情人》。二十多岁初次阅读它时,并未感到如何惊艳,甚至觉得乏味。看了同名电影后,找出来重读,那种叛逆又节制的感受,以及更多难以言说的情愫,让我着迷。毕竟啊,时境不同了。

(王文鹏系《大观》编辑部主任、开封市作协副主席)

**县城的带灯者****——评刘星元的县城书写**

■ 罗小培

生于这一个个空间单元内,就像剧场里那些年轻演员之间微妙的竞争或恋爱关系、殊异的人生选择,就像福安巷中攀向别人家的青藤与彼此相知的邻里关系,就像阑尾街所盛放的作者的青春与爱情……县城的人、物的命运故事往往在此上演,对他们而言,空间即生活方式,即情感载体。

另一类是作为作者的想象、记忆、情感、思考之坐标原点的县城物象,如塑料袋、挖掘机、铁质楼梯、被遗弃的汽车、忠义武校、县城里的炊烟、指向牌等。作者往往通过对物象的情感投射和对象征意味的建构,去表现县城城镇化过程中经历的阵痛,在社会时代变迁中经历的观念更迭,也写出个体对生死的参悟、对乡愁的眷恋等。

在以县城作为主体书写对象的基础上,刘星元的散文还将表现空间延伸到了乡村和部分城市,这自然与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相关,也和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相关。作为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,他经由县城的求学之路走向城市,又在经历城市的风雨之后重新回到县城。这种在乡村—县城—城市之间往返的人生经历,自然流淌进他的笔下。也因此,在一些篇章中,我

们能跟着他的书写眺望到乡村,如《释恐书》中深黑的红薯地窖,《褶皱》里那缕烙煎饼的炊烟,也能极目曾经作为远方和现实一种的城市,如《涉世书》里写到的在城中浮现。沿着刘星元写下的这些景观和物象,我们得以感受到县城的独特人文风情,也触摸到它的文化性格。在他笔下,县城是混杂的,算命的半仙儿和洗头房的姑娘同时守在第五岔道的一街两面,乡间的烟火升腾在城中村里,手工煎饼和时代快餐可以比邻。县城是包容的,它允许脱节者重新融入人群,找到新的伴侣和新的生活方式,从头开始。县城是无情的,任挖掘机掩埋掉一代代人的情感记忆。县城又是懂得传承的,它把一代代人的生活以文物的方式嵌进地表之下;那些在乡间早已式微或是消失的东西,比如手工煎饼、手捏泥人、蓝印花布,在县城反而被找到了。县城是半熟人社会,在街上随便与人攀谈,“往下捋,不出三四个节点,总会蹦出一个与你产生交集的人”,即便陌生的两个男人,也能在遥望的窗口,共享暗夜里一支烟的时刻。

自然,县城也是渗透了作者主观意识的县

的再思考。可以说,这样的县城书写,已从切已走向了万物与众生。

刘星元行文往往冷静而克制,但也不都是这么一本正经的沉思状,读他的文章,也会被他行文中那种诚挚而坦然的敞开状态所打动,被他自嘲矫情的情感寄寓和抒发所打动。那座县城火车站,作者在从此处与远方来去的过程中,县城作为“此心安处”的念头也和他的生活一样日渐安稳落地。他既期待着乡村人事物的到来,也盼望着城市灵魂的归来与暂栖,这种双向沟通与接迎的姿态,这种温暖和照亮周围的愿望,与其说他是“滞留县城的人”,不如说他是“县城的带灯者”。

记得刘星元在谈及《小城的年轮》的时候提到了一张自己拍摄的照片:在枯木年轮清晰的截面上,一株嫩苗正在一圈和另一圈年轮的缝隙之间生长起来。同样,我确信,在那片土地漫长的历史中,在它的一段和另一段时光之间,属于刘星元的县城正鲜活起来。

(作者系《湖南文学》编辑)